

北大老宿舍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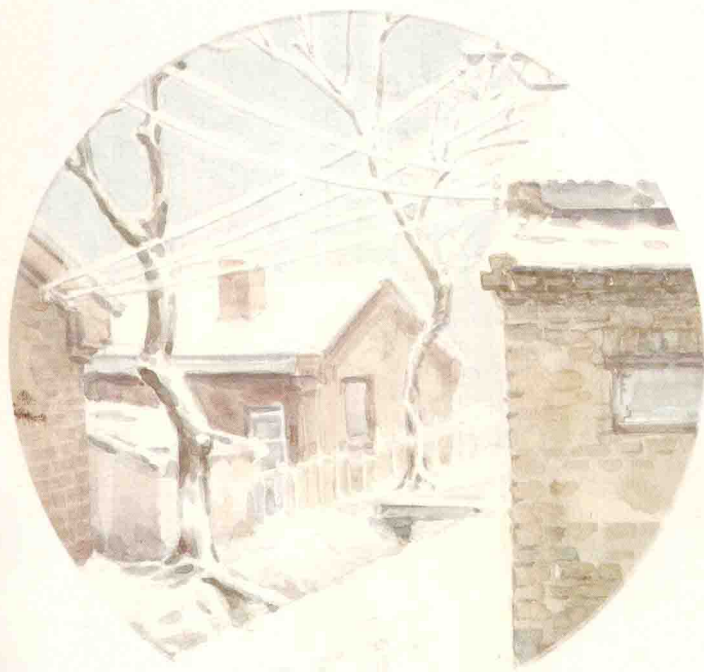
中 关 园

张晓岚

陈其

陈端

等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老宿舍纪事

中关园

张晓岚

陈其

陈端

等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 / 张晓岚等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301-24175-2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2219 号

书 名：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
著作责任者：张晓岚 陈 其 陈 端 等编著
责任编辑：丁 超 黄维政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175-2/K·104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42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中閨園



人才薈萃的百花園

張世英題



二〇一三年十月廿六

目录

由中关园所想到的(代序)	沈克琦	1
--------------	-----	---

一 渐远的背影

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	吴 同	9
忆国学大师张岱年	张晓岚	12
我认识的当代著名哲学家洪谦教授	洪啸吟	15
一段忘不掉的经历	黄志勤	24
回忆父亲程民德二三事	程卫平	33
芳邻		
——记徐光宪先生	吕孟军	41
我的父亲胡世华	胡永千	45
童年往事	朱 襄	56
蜡炬成灰泪始干		
——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	吴 同	73
重访中关园 再忆旧事	汪 建	78
西南联大学生抗日从军亲历记		
——黄枬森忆1944—1945年参加青年军往事	黄 丹	90
邻居赵伯伯	徐 冰	98
怀念赵宝煦伯伯	陈蓓华	101
怀念爸爸	尹北雁	103
我所知道的中关园	吴小如	115
回忆父亲在中关园的日子	林 明	117
回忆父亲罗荣渠先生	罗 曙 罗 晓	128
回忆我的父亲闵庆全	闵 燕	143

怀念我的父亲陈信德	陈昭宜	149
父亲像座山	张若英	163
怀念父亲李欧先生	李宗仪 李宗伦 李 建	166
父爱	江 凡	186
桃李满天下	陈 端	190
回忆翁祖雄、林美惠先生和我的左邻右舍	陈 选	192
记我们的父亲母亲	陈 端 陈 其	204
习练书法 身心舒畅	黄 丹	235
关于陈玉龙伯伯书法作品的回忆	张晓岚	238
中关村童年印象和我的父亲母亲	张晓岚	240

二 难忘的故园

归	陈 端	255
童年记忆二三事	杨 选	256
中关村记事	罗 曙	260
中关村情思	陈 其	264
谈谈中关村	刘兴衢	268
曾在中关村居住的体育人才	孙东恢	271
童年中关村那点事	江 凡	273
中关村的小桃园	黄惠群	282

三 我的同龄人

怀念中关村旧友吴照	廖福园	287
忆中关村生活	商孟可	290
中关村的三人缘	范伯玲	304
蔡明，我对你了解得太晚了	黄 萱	314
中关村人在莫斯科	陈 端	317

四 中关村人文景观

司徒雷登与中关村墓地	林 明	321
中关村建设考和中关村平面图	李 钢	329
附录一：1967年的中关村卫星图		341
附录二：中关村老照片		342

五 诗情画意

郭兴业 沈正华 王建军 关颖颖		
赵 晴 商孟群 金 凡 廖福园		349
魂牵中关村（跋）	陈 端	355
编后记	张晓岚 陈 其	358

由中关园所想到的(代序)

沈克琦 |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物理系教授

自从 1952 年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往美丽的燕园，中关园就和北大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和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人的生活、事业与友情息息相关。近日，“我们的中关园”网站的负责人之一，西南联大校友、我的同龄人张世英先生的公子张晓岚要我为中关园的下一代所撰写的回忆父辈的文集作序。是否接受这个命题作文？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思考了好几天。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我有责任和义务接受任务；但面对厚重的历史和下一代的殷切期待，自己年老体弱的身躯和理科的背景，又让我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担忧所困扰。幸有小女沈正华的不断催促和鼎力相助，我才草成此文，主要是想借此机会谈一点建议，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

60 年光阴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我们已进入耄耋之年，我们的一些同辈已作古；当年总角之年的孩童，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不少已离开工作岗位，安度晚年。和我们的国家一样，当年的孩子们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幸福时光，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疾风暴雨，上山下乡的艰苦锻炼，改革开放后的努力拼搏，以及成家立业、下海经商、出国深造……无论是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还是一路拼搏攀登事业的巅峰，他们大都保持着平常心态，处荣辱而不惊；无论是对长辈还是小辈，他们都满怀仁爱之心，讲奉献而无悔。老一代的晚年因他们而幸福安详，下一代的成长因他们而洒满阳光。

从宏观上看，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成长

和成才，从微观上看，生活的家庭、读书的学校、结交的伙伴决定了一个人的人品和人格。中关园在他们心目中远远超出一个地理名称、一片居民小区，而是和他们幸福的童年紧紧相连，和儿时的伙伴密不可分，和北大的众多名师连在一起。中关园既见证了他们自己的成长历程，也见证了父辈的坎坷艰辛。在2010年付梓的《我们的中关园》2卷本中，孩子们回忆幸福的童年、儿时的伙伴、尊敬的老师、居住的环境……写人、写景、叙事、状物，真实生动、朴实无华。此后，他们又决定要发掘那些封存已久的记忆，重点写写自己的长辈。这一过程于某些人而言，是伴随着痛苦甚至泪水完成的；但对全体书写者而言，它更是一个体味人间亲情、展现父辈情操、彼此深入了解的过程。截止到2012年9月底，共收到36位北大人及北大子弟撰写的43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分成三组：主要记述老一代的“渐远的背影”，回顾中关园生活的“难忘的故园”以及记述儿时伙伴的“我的同龄人”。撰稿人中不乏旅居海外多年的游子，心头那份挥之不去的中关园情结和对长辈的无限怀恋使他们心潮澎湃，笔下流淌出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让一位位长者、逝者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鲜活起来。他们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执着的追求、无疆的大爱在每位读者的心中得以传递。我虽然没有悉数阅读这些文章，但也受到后辈精神的感召，决定谈一些看法并介绍一些我所知道的中关园的历史情况，与大家共享。

中关园是北大的一部分，中关园的孩子们是在北大这一个大环境中成长的，北大的精神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北大是20世纪初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秉承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治学、育人、著文、立说、结社，他们为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先辈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北大的优良传统。近来为大家广为称颂的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大师们在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创造的，尽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种精神一度受到打击，但北大师生思想上一直受其感召，行动中始终努力践行。我想后辈在追思往事中应该注意发掘先辈的这种精神，并加以传扬，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以慰先辈在天之灵。

另外，我就中关园的历史提供如下一些情况：

1. 院系调整

政务院 1951 年 10 月 30 日第 113 次政务会议批准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中提出：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这一调整方案后来有所改变，如：法学院仅政治经济学专业调入新北大，成为经济学系，政治系、法律系调入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地质系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社会系调入中央民族学院……院系调整后新北大共设 12 个系、7 个专修科、2 个医预科、2 个华侨先修班、2 个东欧留学生班、1 个工农速成中学。

北大以燕京大学的校园为新校址。由于燕大学校规模小，全校校舍仅 8 万 m^2 ，调入新北大的除北大、清华有关学科外，还有北师大、辅仁等校的部分学科，因此修建教学楼、教职工及学生宿舍等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成立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主任梁思成（清华大学），副主任张龙翔（北京大学）。

2. 中关园教工宿舍的设计及建造

1952 年 1 月 8 日，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将三校调整建筑经费概算及建筑计划草案上报教育部三校调整组，其中北京大学部分包括在燕大东面征地建设教职工住宅。按照上报的草案，中关园将新建 70 m^2 住房 90 所，50 m^2 住房 90 所，35 m^2 住房 100 所，20 m^2 住房 30 所，家属房面积共计 1.49 万 m^2 ，实际施工时户型和套数均有更改。

中关园住宅基本建成后，曾邀请一批北大、清华的教师参观，大家提议最大面积 75 m^2 对于人口较多的家庭而言还是太小，应适当增加面积。于是决定将已建好的 50 m^2 房屋两套并一套，最终将 50 m^2 的住房减少了 40 套，改为 20 套 100 m^2 的。在 1952 年底完成的中关园新建教职员工宿舍总面积为 1.8548 万 m^2 ，包括：100 m^2 一套者 20 户，75 m^2 一套者 96 户，50 m^2 一套者 64 户，35 m^2 一套者 72 户，24 m^2 一套者 30 户；公寓一座，包括两栋楼房和一个公共食

堂。^[1]综上所述，沟东、沟西共计建成平房 282 套，加上一公寓的 43 套住房，合计 325 套住房。一公寓紧邻食堂，各户没有建厨房。35m² 以上的住房都有厨房和厕所，24m² 的住房没有厕所，另建公共厕所。

设计中的问题。设计之初考虑采用火墙取暖，因此中关园大部分户型厨房中都砌有大灶，有烟道通向起居室用于采暖的火墙，房顶上有砖砌的烟囱，后门外盖有储煤的小棚。校内大饭厅东侧新建的学生宿舍 1—15 斋（“文革”后陆续被拆除）也采取火墙取暖。取暖用的是阳泉煤，燃烧时火力充足。但不久因发现火墙上出现裂缝，怕煤气泄漏造成安全隐患，于是宣布全校停用火墙，改为煤炉取暖，一律加烟囱。中关园宿舍厨房中的大灶随后也被各家拆除。

生活辅助设施。为方便北大员工的生活起居，中关园中建了幼儿园、商店（合作社）、工会活动室（可借阅图书）等。32 路公交车原来是从海淀大街直接通到西门，然后去颐和园。当时未开东南门，去西门须经成府，入东门，穿燕园，居住在中关园的人搭乘公交车很不方便，后来才在中关村设了公交车站。

后续的基础建设。1954—1955 年期间，先后建成了二、三公寓，面积比一公寓大，全部有厨房，而且采取公用锅炉解决取暖问题。因一公寓很长时间没有厨房，各家不能完全依靠食堂解决吃饭、喝水问题，只好在楼梯口支起煤饼炉，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文革”后才对一公寓进行扩建改造，在北侧增加了厨房。

3. 教工宿舍住房分配

除了新建的中关园宿舍（包括一公寓）外，全部燕京大学的教工宿舍都作为房源参与分配。

单身教工宿舍。除燕大原有的单身教工宿舍外，还将未名湖西北燕大男生宿舍改为教职工单身宿舍，湖滨的这七座建筑（从西向东排列）依次被更名为：才、德、兼、备、体、健、全斋。后来有人提出不应将“才”放在“德”前面，于是二字调整顺序，则斋名也随之修改。当时各斋均有一部电话，全部靠接线员手工接线，“兼斋”和“健斋”难以区分，于是“兼斋”被更名为“均斋”。

[1] 见 1952 年 12 月底北大总务处起草的《北京大学校园面积房屋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分析》报告，收入《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68 页。

教工家属宿舍。原来燕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分布在燕南园、燕东园、镜春园、朗润园^[1]、蔚秀园、佟府、勺园、农园等处，还有不少教工分散居住在成府街（包括蒋家胡同、喜洋胡同、书铺胡同、槐树街等）和海淀镇（冰窖、军机处等），这些房子产权均归燕京大学所有。院系调整后，以上各处的住房和新建的中关园平房及一公寓一并作为待分配的家属宿舍房源。

住房分配原则。在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首先制定了家属房的分配原则——分房时须考虑职称、资历及家庭人口等因素。先按职称排队，职称相同再按资历排。夫妇二人均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考虑到他们备课需要两个书房，适当增加面积（如化学系傅鹰、哲学系任继愈、物理系谢义炳等）；家庭人口多的也适当增加面积（如生物系陈阅增）。当时房源相对宽裕，大家也比较谦让，因而分房没有出现多少困难。还有一些教授按资历本应在燕南园或燕东园居住，但他们自己选择住中关园，如：物理系的王竹溪和化学系的张青莲。另外，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分房时同系的教员尽可能安排就近居住。因此，许多老一辈因同行所结下的友谊，由于是近邻，也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下一代。那时具体分配工作由沈克琦（北大）、胡祖炘（清华）和于效谦（燕大）三人负责，我们曾把全部房屋察看一遍，最后的分配方案由筹委会办公室文重审定。当时房租的确定也十分简单，一律按每平方米每月 0.10 元计算。

4. 中关园名称的由来

中关园所在的地方属中官村^[2]范围，当年二公寓前一个小平房上钉着写有“中官邨”三字的小木牌。另有一地图，有老村民住房的号码及分布情况，大部分在新北大范围之内，一部分在与北大毗邻的科学院范围内。图内还有一处标有“中关”二字。这一片新家属区建成后，须为之命名。我本人曾参加由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副校长主持的会议，会上负责基建的同志介绍了上述有关情况，最终汤用彤先生拍板定名为“中关园”，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当时中科院也在这一带建房，负责基建的机构时称“西郊办公室”。北大称中关园后，他们

[1] 朗润园那一组颇有气派的房屋系光绪帝之弟载涛所有，为燕京大学租用。新北大成立时继续租用。1953年北大出资购入而成为北大房产，承泽园也在那时购入，原系张伯驹所有。两处共花费20亿5000万元（旧币），币制改革时1万元旧币折合1元新币。

[2] 中官：一种解释是古代官名，但亦有宦官之意。沿袭此名，显然不当。

随之采用“中关村”地区的称呼。

5. 从城内往西郊的搬迁

1952年9月16日起，迁校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北大的数、理、化、俄语、东语、西语六个系的图书期刊和仪器设备已先从城内搬往燕园。清华部分仪器设备运来，图书期刊全被留下（因北大、燕大两校图书期刊合在一起已足够使用）。

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10月6日起总办事处开始在新北大办公楼办公，原北京大学筹委会及筹委会办公室即日起结束工作。在开学后的一段时间内，因学生宿舍尚未全部竣工，有些学生就在东操场的第一体育馆内打地铺，直到10月18日，学生才全部由城内迁到城外，尚有部分教师没搬家。10月20日旧生开始上课，11月8日新生开始上课。当年教师的搬家由学校统一安排，各家只需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学校派车拉到燕大即可，比现在搬家省事多了。原来租用学校的家具也可随行李一起搬过来继续使用。

我家1952年10月搬到中关园沟东234号，1958年夏天又搬到沟西78号居住。1968年“文革”中，物理系的造反派看中了我家的房子，强迫我们对调，于是全家被迫迁出中关园。屈指算来，我们在中关园度过了16年美好的时光。在这里，三个孩子从学龄前儿童成长为中学生，最后全部上山下乡。闲暇时翻开老相册，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全家照，仿佛又回到了中关园，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沈克琦、张星夫妇在西南联大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

一

渐远的背影



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

吴 同

钱锺书（1910—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20世纪50年代住中关园平房26号。

作者吴同，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之女，20世纪50—60年代住中关园平房6号。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转眼钱锺书伯伯已经走了十多年了。依照其遗愿，不建墓碑，骨灰无存。一代国学大师、“文化昆仑”就这样离开了，潇洒如浮云。

幼时在中关园，钱伯伯是我家座上客之一。他们一家经常于傍晚在小树林一带散步，途经我家门前，钱伯伯常会驻足，让妻女先行离去。每次钱伯伯来访，都会在父亲的书房中坐上一两个小时，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地聊上一阵。两人同为江浙人，年龄相差近十二岁，实为忘年之交。他们的友情始于40年代，其时正逢钱伯伯的《谈艺录》问世，在文学界掀起巨澜，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此书属“阳春白雪”之作，因之曲高和寡，知音甚少。我父亲当时为燕京大学西语系一年轻教授，读了《谈艺录》后，父亲写信给钱伯伯提了一些意见。父亲的意见全部为钱伯伯采纳，随之对《谈艺录》作了部分修改。两人长达二十载的友谊自此开始，父亲也被冠以“小钱锺书”之称。这一友情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如不尽而来的滚滚长江，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经历了“反右”及“文革”的严酷考验而历久不衰。

树大易招风，才高易招妒，古来如此。钱伯伯1998年去世后，关于他的文章如雪片漫天飞舞，褒贬不一。虽以赞扬者居多，但也有一些人批评钱伯伯恃才傲物，更有少数人对其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我绝对不敢评价钱伯伯的学术造诣，因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渺小如沧海一粟，而钱伯伯就

是那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不过对于钱伯伯之秉性为人，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的。

在我印象中，钱伯伯属于那种锋芒毕露之人，喜怒形于色，爱憎极分明。他眼中容不得半点沙粒，对于看不惯的人与事，钱伯伯绝不掩饰自己的感觉，说起话来不留情面，言辞尖锐，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其中不乏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不过对于自己的亲朋故旧，钱伯伯总是充满深情，古道热肠。我永远不会忘记“文革”初期我父亲含冤辞世后，钱伯伯、钱伯母对我们母女解囊相助，恩深似海，永世难忘。

我母亲是钱伯伯在社科院文学所多年的同事。虽然父亲与钱伯伯过从甚密，但母亲与其交往并不多。“文革”开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我母亲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也未幸免。她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能领32元生活费，我们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拮据万分。那时她每天与钱伯伯等多名“反动学术权威”一起在社科院大院里劳动。钱伯伯几次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时悄悄对母亲说：“蔚英，生活上有困难尽管告诉我，千万别客气。”寥寥数语使母亲难以自制，泪如泉涌。其时钱伯伯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却还惦记着我们一家。虽然母亲一再说生活没问题，钱伯伯一家仍多次“雪中送炭”，帮助我家渡过了“文革”时期生活上的难关。也使我们在那个世态炎凉的年代尝到了人间温暖，看到了黑暗中有一丝曙光。

社科院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返京后，我家有幸与钱伯伯、钱伯母成为紧邻。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志同道合的伉俪之一，几十年相濡以沫，珠联璧合，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时他们已经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来往，终日埋首学术，潜心钻研。邻居们曾多次目睹小轿车来接钱伯伯赴会或赴宴，但均被他婉拒。他家也不乏“名流贵客”光临，这些人虽位高权重，也常常免不了吃闭门羹。钱伯伯秉性高洁，不改书生本色，拒绝逢迎权贵，厌恶官场应酬，处处显示了其“出污泥而不染”的铮铮傲骨。有人说他处世圆滑，因之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得以过关，这是不真实且不公平的。

我那时仍在天寒地冻的北国风雪荒原接受“再教育”。每逢回京探亲登门拜望，他们都如见到久别重逢的女儿般高兴，立即放下手头书卷，与我聊天，问寒问暖，深情厚谊，溢于言表。钱伯伯经常与我谈及父亲，为其生不逢时、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记得钱伯伯曾说父亲是他的“钟子期”，慨叹“钟期既逝，奏流水为何人”。言谈话语中饱含着这位一代鸿儒对昔日友人的